

0067

6007.524.57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

唐 纯 良

哈尔滨师范大学
1991 年 7 月

内 容 提 要

1.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就是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七十年。今日中国欣欣向荣,满园春色,阔步前进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

2. 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对经过十月革命发展了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理想忠贞不渝;它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反对教条主义的必要性。因而它能够把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毛泽东思想最完美地体现了坚持和发展的统一。

3.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次飞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这次飞跃是由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杰出领导人(以毛泽东为代表)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实现的。这次飞跃是在反对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斗争中实现的。这次飞跃突破了片而不断革命论、中间势力危险论和城市中心论等三个错误或教条式理解。

4.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二次飞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践。这次飞跃是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杰出领导人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实现的,是在纠正种种以急于过渡和急于求成为特征的空想主义错误斗争中实现的。

5. 只有科学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企图动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必须继续反对教条主义和空想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诞辰 70 周年到来的时候,最令人世人瞩目的事实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东欧发生剧变,世界反社会主义势力高叫“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的形势下,巍然屹立。这个拥有十一亿多人口的大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披荆斩棘,战胜艰难险阻,使自己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改革开放政策之下,不断取得新胜利。尽管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正在阔步前进。社会主义中国欣欣向荣,满园春色,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盎然的生命力。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的 70 年就是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 70 年,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 70 年。

一、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坚持和发展的统一

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理想的忠贞不渝,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早在中共“一大”会上,一个刚刚诞生的幼年党,它的代表们就断然拒绝了经院式研究学说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提议,而把下列条文写进了它的第一个纲领中去:

1. 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到消灭阶级差别;
2. 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3. 废除资本私有制度,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4. 联合第三国际。^①

早在十月革命前夜,列宁在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斗争时讲过一段著名的话:“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②把中共“一大”纲领同列宁的话相对照,可以判明中共一开始就坚信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和经过十月革命实践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年轻中共的这种坚定立场,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中国最先进、最觉悟成分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正确选择。决定这种选择的是中华民族的险恶处境和中国革命的迫切性;是不久前发生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和民主共和国救国方案的破产,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榜样,使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看到解放的新希望和新方向。这些历史条件不仅决定了他们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而且还使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最先把握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他们来不及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指导俄国革命成功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极强的实践特色,一下子就征服了先进中国人的心。他们很快就认识到,阶级斗争理论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根金线”^③,是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不二法门”,因而“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④。总之,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革命的历史过程,就是一边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一边加深研究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一个历史特点,也是一个优点。

如同世间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中共这个特点和优点,也产生了另一种倾向的可能。即由于自己理论准备不足和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坚信不疑而发生某种迷信倾向。这就为接受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的传染,提供了条件。这种错误首先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发生。大革命后期开始出现“用电报指挥中国革命”的现象。30年代前期,在苏联培养出来的少数党内教条主义“理论家”,唬住一些没能很好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土包子”,在党内推行这种错误。他们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推行“左”倾错误政策,几乎断送中国革命。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⑤曲折痛苦的历史和巨大的代价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忠贞不渝,又要牢记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历史昭示我们必须把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奋起倡导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并为此进行了大无畏的斗争。一方面坚决地反对和纠正那些背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方面有效地反对和纠正教条主义“左”倾错误,才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最完美地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的统一。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70周年的时候,我们仍然面对着这个历史性的课题,必须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和发展统一这个历史性课题的第一张圆满答卷,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理论。这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般性发展,而是这一学说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这次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实现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在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不存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世界范围内创立了一个同俄国十月革命相媲美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典型。这个新典型的实践经验和革命理论极其丰富,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占人类大多数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人民革命运动的最有应用价值的理论宝库。它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极大的向前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极丰富的内容。本文仅就构成这次飞跃在理论上三个关键性的突破,作一些探讨。

第一是对片面不断革命论的突破。不断革命论(也称不间断革命论或不停顿革命论)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大家熟知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这种社会主义(指科学社会主义——笔者)就是宣布不断革命。”⑥列宁依据不断革命原则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在两个革命阶段的战略方针,并且按照这一战略思想成功地领导了俄国革命。

但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这个不断革命的原则和经验被教条化理解而走上片面化的错误,成为一种“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如果我们查阅一下马克思和列宁的有关著作,就会发现:他们都明确主张在那些没有完成反封建任务的国家,革命应分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他们的不断革命论,都是在反对那种“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某一过渡阶段以与其他各阶段相对抗”的错误时提出的;他们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欧洲和俄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显然他们的“不断革命”原则,并不包含绝对化的含义。不分时间、地点、条件的“不断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含义。后来把不

断革命片面化,是由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造成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做为反对巩固十月革命成果,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进行派别活动的武器;斯大林则用片面不断革命论为他提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社会主义改革和反“布哈林右派”斗争的武器。两个对立的领袖竟相大搞片面不断革命论,以至于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似乎片面地、无条件地讲不断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正统,否则就是背叛列宁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他不仅在苏联,还在同俄国情况大不相同的半殖民地中国,支持“左”倾教条主义者积极推行片面不断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正确路线的领导,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深切了解这种片面性的危害,勇敢地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独创性的解决。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⑦后来,又明确地把这个论断概括为“不断革命论同革命阶段相结合”^⑧。

这个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关问题的重要新贡献是:一,它不仅划清了两个阶段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界限,而且指出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性,是中国革命的一条重要规律;二,它明确规定在长期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只要不获全国性的胜利,就不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三,它明确宣布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没收官僚资本之外,不再掺杂任何社会主义因素。这就划清了它既不同于旧民主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界限,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

第二,是对中间势力危险论的突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国情有段精彩的分析:“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⑨用毛泽东这个正确分析统一全党认识,经历了同“中间势力危险论”长期艰巨的斗争。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斯大林和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⑩,汪精卫的叛变又标志城市小资产阶级上层退了革命,“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说中国正在“阶级力量‘两极分化’”。这些说法的共同点和根本问题是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力量划到反动营垒里去。

这种理论的实质就是否定中国革命最基本问题之一,即否定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和可能。由于原则上否定统一战线的“天真幼稚行为”早就遭到列宁的严厉批评,于是他们就发明了“下层统一战线”理论。似乎他们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主要指农民——作者注)联盟政策”或“工农苏维埃”就是革命统一战线的体现。应当指出,工农联盟的确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但它不是革命统一战线本身。有了工农联盟,并不等于就有了统一战线。用它代替统一战线,就直接违背了列宁关于“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同盟者”的教导,就是

“丝毫不懂得现代科学社会主义”^①。实质上就是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

这种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理论,从中共“六大”开始在全党统治达七、八年之久。这种理论“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一边去”^②,使党脱离群众遭到孤立,造成革命巨大损失。可见,中间势力危险论的危害之大和突破它的严重意义。

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独创性贡献之一。毛泽东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而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一个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反动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有明显的区别,是一个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阶级。对中国资产阶级这个基本分析是正确看待中间势力的出发点。毛泽东强调中间势力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力量,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他们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争取他们是一项“极其严重的任务”。^③毛泽东明确划分中间势力的范围。中间势力的政治群体,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到抗日战争时期基本定型。它们由众多的民主党派、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杂牌军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和开明绅士组成。毛泽东指出,对这些统战对象,一般地说也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但是,对他们的斗争,同对暂时同盟者大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同的。对他们的某些斗争,主要是达到教育和限制其动摇性,争取他们成为较好的同盟者的主要目的。为此必须创造三个条件,这就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教育他们并领导他们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

只有争取到中间势力,才能形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队伍,无产阶级才能把中国的“中间大”全部拿到手,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孤立敌人和壮大革命力量的目的。所以,突破中间势力危险论,确立起争取中间势力的理论和政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建设的重要一环。

第三是对城市中心论的突破。城市中心论同片而不断革命论、中间势力危险论不同。后两种理论是二、三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偏差或错误,是属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或主观附加;而以城市为中心进行革命斗争,则是中国革命胜利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统”。它不仅有马、恩、列著作的依据,而且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例。

其基本内容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重心应在产业工人集中的城市;党利用合法斗争,把无产阶级力量组织、动员和积蓄起来;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即革命危机到来时)把和平的合法斗争,转为武装起义,推翻反动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是马、恩时代对这条道路的试验。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使它成为经过实践检验的一条革命道路。

但是,它只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具体道路,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基本原理必须坚持,而具体革命道路必须因时、因地而易。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际上是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产生的一种错觉。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来说,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④

依据中国特殊条件执行武装夺取政权原则的全新创举,是毛泽东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开辟之后,首先遭到托洛茨基派的咒骂,说无产阶级政党工作重心转上农村,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基础,放弃无产阶级革命主力,不仅革命要遭到失败,党本身也会变成农民或小资产阶级的党,是背叛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农村武装斗争,但是,他不支持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革命道路。相反,他支持中国党内教条主义者用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正确路线。而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时,他又怀疑中国党是否改变了无产阶级性质。总之,克服城市中心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付出了重大代价,经历了十分艰巨的斗争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分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后,指出中国同俄国的差异:第一,是革命领导和革命主力的不同。在欧洲和俄国,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也是革命的主力军,在中国,无产阶级虽然已经成长壮大到足以领导中国革命的水平,但它属于“两头小”的一头,人数很少,占人口很小的比例,因而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无产阶级同这个主力军结合,才能形成强大革命力量,实现自己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在中国,区分领导力量和主力军的不同,是正确解决全党工作重心的前提。第二,是城市和农村的地位、作用不同。欧洲和俄国是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城市,城市可以完全控制农村;中国则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虽有一定发展,但广大农村仍基本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裂剥削政策,使中国处于政治上不统一状态。尽管中国的统治者可以控制中心城市,但不能严格控制全国,特别是无法控制广大农村。广大农村在经济、政治上都可不依赖城市而自立。第三,城乡政治力量对比的不同。在欧洲和俄国,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在城市里可以形成对反动势力的优势,可以在城市击败反动派获得全国政权;在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长期盘踞城市,实行残暴的统治,不给人民任何民主权利,不存在用来训练和组织无产阶级的条件,无法形成无产阶级的优势地位,能够举行中心城市起义,夺取政权。而无产阶级则可以派遣自己的先锋队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政权,实行武装割据,先在局部地区形成自己对反动势力的优势,经过长期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第四,在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虽然远离工业无产阶级集中地区,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通过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和组织训练,克服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包围所形成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发展和建设共产党组织,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形成了不同于十月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完整新理论,并且通过长期斗争,终于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这条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实现了上述三个关键性的突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个基本要素(即三件法宝)——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农村为基地的武装斗争和在以农村斗争为工作重心的条件下建设无产阶级党——就基本形成了。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其基本路线——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发展的第二次飞跃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及其基本路线,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中

国发展的第二次飞跃。这次飞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实现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一样,在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是不存在的,但是它之所以被看作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的新飞跃,不在于它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概念,而在于它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所提出的重大实际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理论概括,并且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条引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到达彼岸的正确路线。应该说,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早已出现在世界之上。它本身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结果,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未曾预料到的新情况;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设计并且领导了突破资本主义世界薄弱环节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在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新国家,刚刚得到稳定,他就去世了;斯大林领导的在落后俄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并不完全成功,但国内外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历史掩盖了它严重的缺陷,反而在很长时间里被认为是一种应予仿效的模式;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苏联的模式和自身空想主义的影响,20余年不能准确认清其所处历史阶段,因而党的基本政策也不稳定。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灾难之后才在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下,正确解决了这个历史性的课题。中共“十三大”才作出了历史性的理论概括。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首先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选择和发展方向的完全肯定。我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的正确选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可以跃过资本主义制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作出“初级阶段”的论断,是以肯定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那种借口这一论断和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事实,要求“补资本主义课”的主张,是开历史倒车,是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表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我国社会国情再认识的结果。“认清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⑤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步就是认清国情,然后才可能产生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国情是个历史范畴,它是随历史进程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建国以后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情大不相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情又有新的变化。认清国情需要有一个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国情的要素包括社会制度和生产力水平两个基本方面。空想主义错误地认为既然社会制度能够跃进,生产力也可以跃进,以为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解决生产力发展的成百年差距,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夜之间实现理想的天堂。其后果是真诚美好的主观愿望,造成严重灾难的后果。“大跃进运动”和“继续革命”反而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用务实精神取代空想主义思想,在坚持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承认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事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其基本路线就是在这一正确思想路线基础上产生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其基本路线从根本上解决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为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确立了牢固的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工作到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八大”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定，但很快遭到了否定。以后实际工作上虽有反复，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被定为基本路线，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对我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生产力并存的现实，没有统一认识。“初级阶段”的论断，承认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事实，这就为全党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总结我党历史经验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⑮初级阶段的理论及其基本路线，就是从根本理论和政治路线的高度规定和表明我党已经“横下心来”，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的战争，都要“专心致志”，“始终如一”，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大大地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更大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在世界范围内卓有成效地促进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所产生的僵化模式和在空想主义下产生的错误政策，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和对苏联这个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践的过分推崇，形成了一套社会主义建设的僵化模式。更由于我们自己空想主义急性病的错误，使这种僵化模式影响更加严重。在所有制方面，不顾生产力水平，盲目求纯，过早消灭一切私有经济，追求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更形成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并且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在经济建设方面，不顾条件和可能，追求高速度“大跃进”；在经济管理上把商品生产和市场作用理解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而加以否定，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过死过细；把独立自主片面化为闭关锁国政策；对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领域里，不可避免存在的阶级斗争加以夸大，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错误政策的恶果早已在社会生活中显露出来，党内外要求改革的呼声早已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恢复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历史经验，拨乱反正，逐步深化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有效消除了急于过渡和急于求成的思想，终于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就使我们兴利除弊的各项改革更加自觉，并且走上了正轨。

在我们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落后大国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极其宏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由于我们有了正确的基本理论和路线，就走上笔直的康庄大道，毫无曲折和困难地达到目的。不是这样的。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次飞跃不一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标志着那次飞跃的圆满实现，而第二次飞跃所指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从长远观点看，还只是刚刚走上正确的轨道。未来的建设和改革事业仍将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许多未想象到的险阻，许多未认识到的必然，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逐步解决，并且反转来发展理论，改善政策。但是，正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那样，认识了必然，即获得了自由。正确的国情分析基础上的正确路线一经产生，我们的革命事业的

胜利就有了保障。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这次飞跃,必将带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这是毫无疑义的。

四、只有科学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的命运取决于它的战斗。最初它就是做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而确立起来的;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它又经历了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激烈斗争,从而实现了自己的重大胜利和发展;十月革命以后的70多年来,它主要是在同教条主义和空想主义斗争中得到新的胜利和发展。它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具有这70多年战斗的典型意义。它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次飞跃,主要是同那种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为特征的教条主义斗争中实现的;第二次飞跃主要是同以急于过渡和急于求成为特征的空想主义斗争中实现的。当前,在“和平演变”国际阴谋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或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又卷土重来。历史正在走着S形的路程。为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和发展,对这种形势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加强对卷土重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作战,同时,继续同教条主义和空想主义作斗争。因此,强调和正确了解“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口号,具有极大的意义。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思想和口号是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提出来的。70年的历史证明这个思想和口号是远见卓识和完全正确的。但是,中共建立后30年间并没有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搞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已经把中国从半殖民地深渊中救了出来。建国以来40多年及今后几十年,我们仍将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并不是高级阶段发达的社会主义。这说明,唯一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它既包含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又包含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必然规律的理论、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和战略策略,以及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等等。它就是中国共产党70年来所坚持的,赖以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中把中国解救出来,并且使新中国日臻繁荣昌盛的科学理论武器。这个理论告诉我们,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天职,但实现这个理想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70年来一直起不良作用的急于搞社会主义革命和急于向高级阶段过渡的思想是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在纪念建党70周年的喜庆时刻,我们更应牢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①真理,认清指导我们通过曲折道路达到光明彼岸的唯一思想武器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注释:

①《“一大”前后》(一)第9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③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④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9页。

⑦《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下同)第614页。

⑧参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⑨《毛泽东选集》第766页。

- ⑩《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3页。
- ⑪《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页。
- ⑫《毛泽东选集》第141页。
- ⑬参见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 ⑭《毛泽东选集》第506页。
- ⑮《毛泽东选集》第596页。
- ⑯邓小平1985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
- ⑰《毛泽东选集》第1061页。